

“鸡鸣三省”度新春

■王悦

1935年2月3日，农历甲戌年除夕。长征中的红军中央纵队官兵拂晓从摩尼出发，经安基屯、东瓦沟辗转70余里，傍晚抵达了四川叙永石厢子彝族乡。该地所处区域东南与贵州赤水、生肌两地毗邻，西与云南水潦接壤，又称“鸡鸣三省”之地。此时的他们，刚于1月29日渡赤水河突破川军防线，同时面对红1军团第2师围攻叙永县城不下、敌军向川南加速合围的危局。

前方是沿长江设防的川军，身后是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隆冬时节，战士们大多身着单薄的灰布军装，完好的斗笠帽已不剩几顶，脚上的草鞋早已磨破，不少人患有伤病，拄着树枝勉强跟进。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电令，明确“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可见形势之紧迫。

在短暂休整间隙，红军抓紧开展群众工作，书写、张贴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没收当地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汉、彝、苗各族群众。在吴桥镇，红军宰杀了团总吴联山家的肥猪，与乡亲们聚餐共度新年，当地群众称之为“红军年”。

住在老乡肖有恩家的毛泽东，分到一碗腊肉和几个辣椒。当腊肉端到他面前时，他却摆摆手不愿吃。大年初一，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员，捐出了发给自己的“年夜饭”。离开时，毛泽东给肖家留下了食宿三天两夜的火耗钱——3个铜板。

一碗腊肉、三个铜板，不仅是领袖对战士和百姓的体恤，更是一场无声的信念传承。夜色里，战士们围坐在篝火旁，有人哼起家乡的过年小调，有人擦拭着步枪。

过年的喜悦没有减弱军情的紧急。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中

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尚未最终敲定，组织调整仍需完善，加之敌军合围日渐收紧，战略方向亟待明确，中央苏区下一步如何斗争的电报迫切需要回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总部进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会议。

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是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研究确定了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的军事路线和组织工作；三是讨论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会议还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并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以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行按既定部署，告别了石厢子的乡亲，向云南扎西镇（今属昭通市威信县）方向转移，践行向敌军兵力空虚地带机动的战略决策。此时的部队，不仅卸下了连日奔袭的疲惫，更因战略方向的明确而士气高涨。这份凝聚力，也让官兵为迎接更艰巨的挑战做好了准备。随后，中央红军在向扎西镇集结的过程中，连续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研究部署全国革命斗争的首次重要会议，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这个战地春节，没有丰盛的年夜饭，也没有团圆的欢聚，却是凝聚信念、铺垫新局的关键节点。它既是长征途中特殊的新年记忆，更是中国革命在转折关头，红军官兵与老百姓鱼水情深的生动缩影。

烽火岁月里的春节记忆

编者按

新春到来之际，“军史发现”版选取来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战地春节故事，与读者分享。

长征路上，三个铜板留给老乡，一碗腊肉送给伤病员，这看似细微的举动，温暖了百姓和官兵的心。抗战时期，一句“敬肉”引来一片欢声笑语，让黄土高坡的窑洞里溢满春意。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官兵在农历新年前后，以昂扬斗志歼灭敌人，在胜利中迎来了新春佳节。抗美援朝战场上，用锅碗瓢盆奏出的乐章，用树枝做成的毛笔书写的春联，诉说着志愿军官兵对胜利的渴望、对故乡的思念。

让我们透过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的春节故事，一起感受岁月荣光和革命先辈们的精神风采。

延安窑洞年夜饭

■于美丽

1940年早春的延安，寒冷尚未褪去。临近春节，黄土高原上刮着刺骨的北风。但在这片革命热土上，却洋溢着别样的暖意。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日、伪、蒋的全面封锁和“围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异常艰难。尽管延安物资匮乏，抗日军民还是利用现有条件，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着准备。

八路军战士们除了搞好战备训练，还想办法置备过年的食品。当时，警卫部队有一个长枪连，正式名称为“中央警卫长枪连”，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保障中共中央领导和机关安全而设立的特殊警卫部队。连队成员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要求政治可靠、军事素质过硬，多为经历过长征或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骨干。他们主要负责中央首长的外围警戒和安全保卫工作，对中共中央机关、重要会议场所、通信设施等进行警卫，防止敌方破坏或袭击。长枪连的一百多名战士，每天操练、站岗，生活极为清苦。由于刚组建不久，家底薄，长枪连过年就只买了20斤肉，每人还分不上2两。就在连里为此发愁时，管理中央首长生活的同志抬着半扇猪肉来了。大家正疑惑间，来送肉的工作人员说：“昨天小灶杀了一口猪，毛主席让送给你们一些过年用。”原来，这是毛泽东同志特意嘱咐给大家送来的。战士们听了都非常感动。

因为他们平常在警卫工作中都知道，中央首长平日也吃不到荤。毛泽东的生活非常简单，就是一点蔬菜或辣椒。于是，连队开会讨论时，不知是谁说了句：“请毛主席吃年夜饭以示感谢。”大伙不约而同都说好，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连政治指导员张久厚。春节前两天，张久厚带着全连官兵的嘱托，来请毛泽东到连里过年。毛泽东听说是请他吃饭，笑着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吃饭嘛，我就不去了。张久厚一听毛泽东说不去，便坚决地

说：“不去不行。要去，战士们等着呢！”这句话把毛泽东逗笑了。他说，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毛泽东略一沉吟，又说，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张久厚高兴地敬了个礼，欢天喜地跑回去了。

为了这顿特殊的年夜饭，全连战士都行动起来。他们把窑洞和训练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欢声笑语在山谷间回荡。到了除夕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来到警卫长枪连。战士们列队欢迎，掌声雷动。

进到窑洞落座后，毛泽东并没有动筷子，而是先问连领导，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样？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很高兴。毛泽东环视了一下，看到所有战士都能吃上肉才放心地说道，我们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里不说，可心里有意见，那就不好了。略作停顿后，他接着说，我们常讲同甘共苦，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众才信服。

开饭后，当时没有酒，战士们就夹着一块肉，热情地向毛泽东“敬肉”，共同祝贺新春。毛泽东一看就笑了，说，这么大的红烧肉，我还是第一次见。

一排长说：“战士们最喜欢的就是大块肉，主席，我先吃为敬！”说完，他便夹起一大块肉一口吃下去。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都被排长那憨态可掬的样子逗得开怀大笑。大家一个劲儿地给毛泽东“敬肉”。毛泽东看了看周围说，能者多吃，互相帮助。说着，他用筷子把肉分开，先放到周恩来碗里一块，随后自己吃了一小块说，怎么样，这回行了吧？就这样，战士们们在欢笑中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吃了顿难忘的年夜饭。

这顿特殊的年夜饭，成为长枪连战士们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它体现了领导人对警卫部队的关怀，见证了官兵同甘共苦的真挚情谊，也诠释着人民军队官兵一致、上下同心的优良传统。

风雪除夕战保南

■陈升

1947年1月20日，农历腊月初九。晋察冀野战军即将迎来一个特殊的春节。为实现依托内线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奉命趁保定以南平汉铁路望都至正定段敌守备薄弱的有利时机，发起保定（定）南战役。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纷纷表示：实现立功计划，以实际行动迎接新春佳节。

行动开始后，国民党军第11战区将主力集结于平汉路北段铁路沿线地区，置重点于平、津、保三角地区。国民党军第3军第32师一部和保安第5总队及县自卫队担负保定以南望都至正定段100多公里铁路的守备任务。国民党军企图长期分割和蚕食冀中、冀晋两解放区，并伺机向铁路线两侧扩展其占领区。继续实施分期“包剿”平汉路北段西侧晋察冀军区主力的计划。

按照中共中央《三个月总结》要求“进一步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晋察冀野战军依据敌情，决定以第4纵队、冀晋军区独立第1旅，在冀晋军区第3军分区和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地方武装配合下，主动歼击保定地区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对冀中、冀晋两解放区的封锁。

时值腊月初寒，部队进行了紧张而有序的战斗准备，掀起练兵热潮，并着重进行了攻坚、战术等训练。我第4纵队根据当时情况和地形分析，决定集中主要力量，向位于定县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保安第5总队侧翼出击。

1947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初八。天降大雪，寒风凛冽。我第4纵队各部从完县、唐县一带出发，分别向预定目标隐蔽挺进。入夜，我第10旅在方顺桥一带构筑工事，钳制保定方向国民党援军的同时，包围了望都国民党守军。我第11旅进至唐河北岸，阻击国民党军在定县方向援军和王京（村）守军出逃的同时，对国民党王京守军实施了包围。20日，我第10旅向望都、我第11旅向王京，同时发起攻击，保南战役拉开序幕。

临近春节，国民党守军突然遭此打击，仓皇应战，最终被我第4纵队一举攻克。我军部队解放望都、王京，切断了定县、保定之间国民党军的联系。为乘胜扩大战果，我第4纵队顾不上欢度佳节，于21日除夕当晚，分路秘密南下。我第4纵队直属队和第10旅沿平汉铁路西侧，进至寨西店西北的内化地区。我第11旅沿平汉铁路东侧，进至寨西店东南的明月店地区，准备横扫定县城南寨西店、新乐等地守军，然后攻取定县县城。

22日，农历大年初一，当天下午，我部队插至定县、新乐之间时，侦察得知驻正定的国民党军向北增援。为创造有利战机，将北援之敌歼灭于运动之中，我第4纵队立即开展夺点设伏行动，于23日攻占寨西店。部队进至寨西店、十家町一带布阵设伏，形成一个正面宽约4公里、纵深长达13公里的袋形伏击圈。24日12时许，国民党军钻进了我军预设的袋形伏击地域。埋伏在正面的我第4纵队第29团展开火力急袭，两侧设伏部队实行拦腰截击。国民党援军遭到突然打击，乱作一团。经过数小时激战，北援国民党军1000余人全部被歼灭。我第4纵队收复了新乐，并决定乘胜攻取定县。

经过攻城前的各项准备，28日6时，我军对定县发起攻击。首先以炮火轰击城上碉堡和垛口，以步兵火力封锁城下地堡。接着，各登城部队迅速冲出掩体，向城下运动。国民党守军遭到突袭，慌忙沿交通壕后撤，从交通壕和东门内两面向突破口夹击、反扑，均被击退。我攻城部队以迅猛之势，从四面八方进攻，摧毁了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中心。国民党守军四处逃窜、弃城而逃。我军立即猛追，国民党军保安第5总队的3个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保南此役共歼敌8000余人，控制了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的铁路百余公里，切断了保定与石家庄敌人的联系，使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为从根本上扭转晋察冀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地春节迎曙光

■徐彤

1953年2月13日，农历除夕。此时距离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已两年有余，战局悄然变化。对于战场上的官兵来说，这一年的春节，既有战火间隙中难得的片刻喘息，又隐约透出战争临近终章的独特气氛。

此时，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掌握了地面战场的主动权。战局的相对稳定，让这个战地春节有了几分“安定”的底色。

更深刻的变化来自后方。经过两年多奋斗，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已然成形。这条用鲜血与智慧筑成的生命线，让前线物资供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53年春节，许多官兵在战场上尝到了“丰盛”的年味——肉、花生米、鸡蛋粉、蘑菇、粉条、萝卜、白菜等食品，甚至每人分到了一些水果糖。这与两年前“啃冻土豆”和“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形成鲜明对比，也折射出志愿军整体战力的提升。

在战线相对平静的地段，春节的痕迹悄然浮现。战士们采来松枝，在坑道口扎起简易彩门，碧绿枝叶间点缀着自制的红花，映出一片顽强而热烈的生机。战士们领回面粉和肉菜，围在一起包饺子。没有擀面杖，就用炮弹壳、罐头筒代替；没有面板，就在弹药箱上摊开雨布。文化教员成了最忙碌的人——战士们找来纸张，用红墨水染成红纸，用绑着棉花的树枝代替毛笔，请他们写下一副副春联，寄托大家对故乡的思念和对胜利的期盼。

当然，战备并未因节日松懈。敌军仍时不时发起骚扰。除夕当天，两个班的敌军悄悄摸上志愿军第40军某部3连阵地。该连官兵不动声色，待敌人接近阵地前沿后，突然开火，全歼来敌并俘虏一名19岁的新兵。

这年轻俘虏被带人坑道后，正逢战士们煮好饺子。他狼吞虎咽吃了数十个，瞪大眼睛问：“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得知这是中国传统的饺子后，他连声称赞。

并非所有部队都能安稳过节。驻守津津江西岸的志愿军第140师，分散执行防御任务，无法集中庆祝。师后方指挥部便组织起一支十余人“演唱队”，由干事、文化教员临时组成，奔赴前沿阵地慰问。这支被战士们称为“锅碗瓢盆协奏团”的小分队，在专业乐器匮乏的条件下，用锅、碗、洗盆等生活用品奏出别样的乐章。他们演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也唱朝鲜民歌《阿里郎》、苏联歌曲《喀秋莎》，甚至用自制“乐器”改编演奏广东民乐《步步高》。演出条件虽然简陋，却让坚守在风雪阵地上的官兵眼眶湿润。

节日的氛围，勾起了官兵对家乡的思念。志愿军第47军战士胡永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常常想到——祖国的老人们看到子女回家过节时；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走家串户拜年时；年三十晚上全家吃团圆饭时；孩子们穿着新衣放鞭炮时……而我们在阵地上、在雪地里、在战壕中与敌人拼杀。正是我们的出生入死，换来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1953年春节处于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此时，停战谈判已在板门店断断续续进行，战场上的僵持实则成为谈判桌上的博弈提供着注脚。

5个月后，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1953年这个特殊的春节，既承载着两年多征战的厚重，也预示着曙光将至的胜利。